



柯棣华眼中的毛泽东

“人生的老师”

□ 宋 典

“毛主席来了！”人头攒动的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的目光齐齐投向门外。人群中一位外国人模样的年轻人也跟着望去，眼神中充满着好奇和期待。他叫柯棣华，是刚刚到达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延安各界专门为他们到来举行欢迎晚会，这是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见。

柯棣华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印度医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同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印度国内掀起“援华热”。柯棣华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毅然决然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与同伴不远万里，历经艰险辗转来到延安，支援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事业，在治疗伤病员、提高八路军医疗救治水平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延安期间，柯棣华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往，深深地折服于共产党领袖的品格与思想，称毛泽东为“人生的老师”，认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革命事业的希望。

平易近人的领袖

柯棣华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紧张和局促状态下开始的。1939年2月12日，柯棣华一行五人，突破重重阻碍，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两千多名革命群众的热情迎接。但因日军不断空袭，欢迎会无法正常举行。14日，延安召开盛大的欢迎晚宴，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柯棣华之前并未见过毛泽东，只是阅读过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初步了解了中国革命事业和毛泽东、朱德等人。等到毛泽东走到身前和柯棣华热情握手时，他才反应过来面前这位身材高大、宽阔额头、面带微笑的中年男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与医疗队成员一一握手后，招呼他们坐在身边，一起观看

演出。柯棣华发现，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灰色棉制服，脚上是一双普通八路军军棉鞋，说话态度和蔼可亲，毫无领导架子。看到柯棣华略微紧张，毛泽东则是微笑着向其指了指身前的火盆，示意他烤火。

这场演出是由抗大学生创作、组织的，其中一个节目就是以来华医疗队为主角。因为当时中外联系不便，了解甚少，抗大学生便按照想象和印象扮演印度人，每个人都贴了厚厚的胡子。但是柯棣华等人却没有胡子。这略显尴尬的一幕被毛泽东幽默化解。他风趣地指了指台上的演员，又直指柯棣华，然后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意思好像是说：看啊，你们在舞台上都长了大胡子！在座的中外宾朋都笑出声来，会场气氛顿时变得轻松热烈。在大家的掌声中，柯棣华等人走上台，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柯棣华随后用并不熟练但充满激情的汉语高呼：“印中两大民族团结起来！”台下的观众欢呼鼓掌。

9月23日，柯棣华受队长爱德华指派进城了解情况，毛泽东听说后，特意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毛泽东先在办公的窑洞接见了，亲切地询问生活是否习惯，工作有什么困难。柯棣华与毛泽东长谈许久，回到住地已是深夜。

国际主义战略家

柯棣华与毛泽东谈话、交流时，毛泽东总会向其询问印度、英国等情况，从国际主义角度审视中国和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认为中印两国要团结合作，共同抵抗法西斯，给柯棣华诸多启发。

1939年3月15日清晨，柯棣华等人拜访毛泽东。毛泽东热情接待，并向他们了解了甘地、尼赫鲁、印度国内外斗争形势的情况。毛泽东说：“中印两国人民都遭受

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压迫，有许多共同点，应当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互相学习。”随后，毛泽东邀请印度医生共进便餐，得知双方都爱吃辣时，毛泽东笑言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联系，“我们这些人要将这悠久的友好关系发展下去。中印人民应该更亲密地携起手来，有了人民的团结，有了国际的团结，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1939年6月，日寇从山西西部跨过黄河，陕甘宁边区遭受威胁。前方作战任务日益加重，柯棣华和同伴多次向中央申请到前线去。在9月23日的会见中，毛泽东向柯棣华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局势，最后指出，人民一定会胜利。柯棣华向毛泽东提出上前线的要求，毛泽东高兴地答应。10月29日，毛泽东向柯棣华等人转达了朱德“欢迎印度大夫到晋东南根据地去”的电报，并叮嘱他们到了前线，要做好医务工作，要学习政治，要宣传抗日和国际主义。

193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医疗队举行了饯行晚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为柯棣华等人送别，他在宴会上心情大好，“席间宾主谈笑甚欢”。大家都为柯棣华等人即将奔赴前线，在抗日烽火中践行国际主义精神感到高兴。

第二天，八路军总医院举行欢送大会。柯棣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谈到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命运和共同斗争，谈到在延安受到的启示和与中国同志建立的革命友谊，特别提到党中央、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时，他眼睛湿润，无比激动。最后他坚定表态：“我们决不辜负中国共产党的殷切期望。”

中国革命事业的希望

柯棣华在延安工作居住了9个月，与毛泽东多次交流。他们一起开会、看戏、唱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在给柯棣华家人的信

中，称其为“我最亲密的兄弟”，柯棣华称毛泽东为“人生的老师”。柯棣华在革命实践中，愈发感受到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希望。

柯棣华发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深受群众爱戴。在延安拐茅镇八路军总医院，他接触到大量老干部、八路军战士和普通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社会，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敬仰。有两位小女战士，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分别从各自家乡四川和安徽，徒步跋涉数千里才来到延安。柯棣华询问她们为何如此勇敢，小战士回答：“想到到延安就能找到共产党、毛主席，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苦和累也就不怕了。”

柯棣华认为，毛泽东深受爱戴的重要原因 是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印度援华医疗队最初先到达的是国统区，看到的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一撤再撤。国民党政府不思救国之策，罔顾人民死活的做法令柯棣华十分气愤，感到“真是使人伤心失望”。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逐渐积聚了抵抗侵略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柯棣华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指明了方向，是中国未来所在。

1942年1月，柯棣华给巴苏华医生写信说：“我真想到延安后好好总结一下我在八路军中所学习到的一切。”令人惋惜的是，柯棣华积劳成疾，后不幸逝世于晋察冀根据地，年仅32岁，没能实现重返延安的夙愿。他逝世后，毛泽东亲笔为其书写挽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最终将民族友人的理想追求在中国大地实现。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坐落干湖北省红安县，建于1977年。纪念碑高27.11米，这个数字是为纪念黄麻起义爆发日——1927年11月13日。碑身正面“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17个金色大字由华国锋亲笔题写。碑身背面镌刻着革命歌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碑基正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篇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董必武的指导和关怀下，黄安（今红安）、麻城等鄂东北各县逐渐建立了党的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建立了农民武装，为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这一地区独立领导开展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九二七年，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黄安、麻城县委发起“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十月下旬，中共湖北省委派干部前往指挥。随即在黄安七里坪成立中共黄麻区特委（符向一任书记）和鄂东革命委员会（刘镇一为负责人），并组成了新的中共黄安县委（王志仁任书记）和麻城县委（蔡济璜任书记），接着又建立了黄麻暴动行动指挥部（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十一月十三日，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和黄安七里、紫云两区千余精锐义勇队集结七里坪，在数万农民配合下，翌日晨一举夺取黄安城，占领县城二十一天，建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曹学楷任主席）。农民自卫军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主要领导人为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刘文蔚、汪莫川）。十二月五日起遭敌大举进攻。起义军民为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浴血奋战，潘忠汝、王志仁等英勇牺牲，蔡济璜、刘文蔚等先后遇难。鄂东军突出重围后，辗转于黄陂木兰山一带游击。一九二八年一月，鄂东军改称第七军，四月重返起义区，七月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在黄、麻、光（山）边界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黄麻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一九二九年又爆发了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成立了红三十二、三十三师，建立了豫东南、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春，党中央决定将三块根据地和三支红军统一起来。旋成立了隶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郭述申任书记）和直属中央领导的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建立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任主席），正式形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一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一军与红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五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下辖鄂豫皖省委。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成立于七里坪，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自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二年夏，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主力红军发展到四万五千余人，地方革命武装发展到二十余万人，建立了二十六县革命政权，总人口达三百五十余万。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建设事业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当时全国规模较大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一九三二年秋，由于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西进川陕后，以沈泽民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腥风血雨中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为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英勇战斗。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奉命实行战略转移。随后，党又组建红二十八军（主要领导人为高敬亭），发展以便衣队为主体的各级地方革命武装，在大别山区坚持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至抗战爆发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担负起东进抗日的历史重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鄂豫皖边区红旗飘扬，武装斗争从未间断，一直是我党我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红旗不倒』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曾鹏飞 熊珍珍

从黄麻起义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二十二年间，党领导鄂豫皖根据地军民经历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全区仅革命烈士就有十四万余名，其中红安有二万二千余名，麻城有九千二百余名。他们的光辉业绩，犹如巍峨的群山、浩荡的江河永世长存，彪炳青史。他们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实践中努力奋斗。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碑文叙述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和浴血奋战的悲壮历程，颂扬了鄂豫皖苏区军民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读后令人肃然起敬，催人奋进。

发动黄麻起义成立鄂东军。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不久，鄂豫皖地区的黄冈、寿县等地就成立了党组织。至1927年5月，仅鄂东北的黄安、麻城等11个县委，就下辖26个区委、69个支部。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13日晚，起义军3万人向黄安进发。他们挑选77名义勇队员组成突击队，于14日凌晨攻占黄安，全歼守敌警备队，活捉国民党县长贺守忠。鄂东革命委员会宣告起义胜利。18日，宣布黄安县农民政府成立，随后，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2月5日夜，国民党第十二军教导师，由麻城经宋埠奔袭黄安。战士们以大刀、长矛、鱼叉与国民党军搏斗，潘忠汝率部死守黄安城，多处负伤后仍以手枪毙伤国民党军多人，终因失血过多而壮烈牺牲。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在指挥工农革命军与敌拼杀中英勇牺牲。

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25日，党中央决定将湖北黄安、麻城等县，河南商城、光山等县，安徽六安、霍山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4月，鄂豫皖特委书记郭述申到达箭厂河，召开鄂豫皖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会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军长。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选举产生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为主席。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相继成立，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北带淮河，同中央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盛时期根据地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人，主力红军达4.5万余人，地方武装、民兵20余万人，建立了27个县级革命政权，是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先后有近百万优秀儿女献出宝贵生命；这里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主力红军，走出了469位共和国将帅；这里武装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享有“红旗不倒”的崇高声誉。

井冈山斗争时期如何开展军民文化建设

□ 朱雨轩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非常重视军民文化建设，积极开展文化宣传，加强文化教育，组织多种文化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工作经验，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

开展文化宣传，鼓舞军民斗志。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及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所以，红军每到一处，都非常注重运用各种文化形式，宣扬革命思想，抒发革命情怀，鼓舞军民革命斗志。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攻占了遂川县城，在公审土豪劣绅大会上，主席台两旁贴着一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革命对联：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中利生利；我今日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这副对联紧扣革命斗争，文辞泼辣，流传很广。1928年秋，毛泽东带领红军一个营前往桂东方向接应红军主力回井冈山。8月30日湘赣敌军乘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红军守军不足一营，凭借黄洋界险要地势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根据地。毛泽东听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汇报，欣然写下词作《西江月·井冈山》。一些红军官兵也套用传统戏曲《空城计》，创作了反映黄洋界保卫战的新剧《空山计》。黄洋界保卫战及其文化创作，给予根据地军民巨大鼓舞。

根据地军民还积极创作了很多革命歌谣。1928年8月，红军编了一首《告湘南各县工农士兵群众

歌》，其中唱到：土豪劣绅真万恶，压迫工农不当人；收租收利收粮税，穿衣吃饭管现成；今见工农大暴动，他的田地怕瓜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红军大力开展文化宣传的影响和带动下，根据地群众也创作了很多歌颂红军和革命领袖的红色歌谣。永新西乡的李右莲爱唱山歌，红军便鼓励她以山歌来宣传群众。1928年根据地遭受“八月失败”，宁冈有些农民听信谣言，跟着反动派去了永新。李右莲就用一首“工农和红军原是一家人，打倒土豪和劣绅。反水农民受冤骗，回家割禾受欢迎。哎呀嘞，快快回家受欢迎”的山歌，动员反水农民回家。

加强文化教育，提高军民素质。井冈山斗争时期，举办培训是加强部队文化建设和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当时在砦市创办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在茨坪开办了红军军官教导队，1928年底还办了红军学校。老红军宋裕和回忆说，文化课也是结合政治内容来进行教学，参加培训每人每天要识五六个生字，识字方法是每天记熟一条标语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等，这样既记熟了标语口号，又识得了生字。学习写字要做练习，由于没有笔和纸，大家就用柴棍子在地上写。当时物质条件不太好，但学员们的精神都很愉快，经常做游戏和唱歌。大家最爱唱的是《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和《红军跑

步歌》等。晚上冷得睡不着，大家就围到火边，有的讲故事，也有的用柴火，你写一个字我认，我写一个字你认，互相“考试”。

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各级革命政权设有文化委员。地方很重视文化工作，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文化委员罗冬祥回忆，他当年抄写了很多革命歌曲和《共产主义者须知》等资料。湘赣边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提出，要加强文化和政治教育，开展认字运动，提高工农革命群众的“写”“看”能力。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不仅提出要提高士兵的文化程度，还提出由工会开办工人学校，由农民协会开办农民学校，由县工农兵政府开办高级工农学校，以提高工农的劳动知识和文化程度。

组织文化活动，活跃军民生活。井冈山斗争时期，部队里的文化活动主要由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以及士兵委员会负责开展。1928年5月中央发出通告指出，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要进行军民的政治教育，负责改善红军战士的生活，组织体育娱乐。

红军的文化娱乐机构源于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时，连队设立士兵委员会，在文化娱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士兵委员会里设有娱乐科，在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或工农兵联欢会、红军纪念会上，会组织演说、新剧、京广团、双簧、跳舞、魔术等节目，深受官兵欢迎。井冈

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和朱德经常战斗生活在一起，下棋成为他们工作之余难得的文化休闲活动。1928年底红军整训期间，朱德借住在江边村农民谢恩光家，毛泽东经常来找朱德谈工作，他们在工作之余很喜欢一起下围棋。当时很多红军官兵都喜欢下棋，虽然条件简陋，但是他们就地取材，弈棋不亦乐乎。有些人喜欢下象棋，找不到棋子，就捡一些瓦砾作为棋子，在地上画一个棋盘，借着火光，就“将”起“军”来。红军很重视文化制度建设，1928年11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案提到，红军政治训练要注意组织各种娱乐，促进红军战士主动参加，能够得到艺术的享受。

井冈山斗争时期，还会举办军民联欢活动。在朱毛会师庆祝大会上，朱德喊口令指挥部队进行了一次分列式阅兵。1928年底，在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上，朱德亲自参加了军事表演，成为展示军威、丰富军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在根据地内，妇女委员会积极组织会唱山歌的妇女参加慰问红军活动。反映1928年红军龙源口大捷的歌谣《打败江西两只羊》，就是永新县妇女慰劳队用《孟姜女》曲调填词而创作的，歌词里的“羊”是“杨”的谐音，指的是当时赣敌杨池生和杨如轩部。边界各县的共青团也积极在儿童、青年中开展文化活动。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